

■书 评

彭龄、章诒《书影月痕》:

读书与远游,彭龄伉俪的人生风景

□叶廷芳

《书影月痕》全书共分四辑,共60篇。它们包括了作者彭龄伉俪几十年的散文精华,浸透着夫妇俩几十年在外交和文学上所付出的才华和智慧乃至做人的风范。

《书影月痕》的作者作为在国外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自然经历过不少激动人心的事件,接触过不少官方或民间的优秀人物,并将其诉诸笔端。例如《天涯逐知音》一文,写的是作者受托将冰心翻译的黎巴嫩大作家纪伯伦的《先知》的中译本带往黎巴嫩一个叫布舍里的地方的纪伯伦博物馆,期间经过许多曲折,在诸多认识与不认识的热心人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读后让人获得一种雨过天晴的喜悦与宽慰。作者还在叙利亚对中国最友好的德鲁兹人中发现并结识了“阿拉伯的白求恩”,即著名诗人奥贝德。他后来应聘来到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一待就是12个春秋。除教学外,还参与了许多我国重要的翻译校订工作,把他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和翻译事业。读后你会觉得,说他是中国的白求恩一点都不过分。

作为有身份的外交官,作者自然有机会接触国际上的某些风云人物。其中最生动的记述莫过于他与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埃及的杰出外交家加利先生的结识了。这位于上世纪90年代在任期间(1992~1996),三天两头在几十亿观众的电视屏幕前露面的国际长官,到1999年已是第10次来中国。但当他见到作者夫妇时并不因对方不是高官而止于寒暄,而是驻足长谈,且态度极为亲切友好。除了彼此语言相通,显然跟交谈的主题——中埃友好有关。当温文儒雅的彭龄夫妇告诉对方曾在埃及工作了4年,并恭恭敬敬地将他们的著作《埃及漫步》呈送给他时,加利先生顿时眼睛发光,不顾语言障碍,立刻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因为书中的许多照片中有不少他熟悉的人。最为动人的是,最后当作者夫妇俩递上本子请加利先生写几句话作为留念时,他并不像一般人那样大笔一挥了之,而是请他俩将本子留下来,等他签好后让埃及大使转交给这两位可信赖的新朋友。

列夫·托尔斯泰在1896年的日记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在任何艺术中间,脱离正道的危险之点有两个:庸俗和做作。两点之间只有一条狭小的通道。两个危险之中,做作更为可怕。”真正能够在“这条”狭小的通道”中抵达艺术核心的作家,葛亮是其中一位。读葛亮的作品,往往会被他正直的态度和饱满的表达瞬间感染,他的文字因带着一种来源于体察和侧隐的真实感受力而闪烁着人性的光泽,那是“温存的底色”。在庸俗和做作的夹击中,葛亮总能借以声音,成功逃脱,直抵他的艺术追求。

葛亮的文字满载着声音的特质,它们来源于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在文本里久久回响,不绝如缕。在《七声》中,我们避无可避地听到藏女英珠在雪夜里与命运的对唱,听到为安抚老伴入睡的老者含泪唱出的《三家店》,甚至听到患有精神疾病的阿霞抓着头发撕心裂肺的叫喊。如果仔细辨别,还可以清晰地听到阿婆的声声呼唤“阿毛头”,听到电话那边的安写满故事的讲述,当然,还有威廉病女不断循环的绕口令。这些声音跳出文字本身,一头扎进了命运的漩涡,聚合成宿命的混响。在抽象的层面上理解,葛亮紧紧把握住的这些“声音”,无不是他对主人公命运深情的凝视,故事本身就成了呐喊之声、呻吟之声、呢喃之声、无声之声。在摆脱了发声的本体之后,它们终于沉淀为生活。

作为开篇的《琴瑟》,大可被看成是长达一生的情话。相伴半个多世纪的外公外婆,经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时代,情比金坚。在外婆晚年患病后,外公的悉心照顾感人至深。怕别人弄疼外婆,他每次都要戴上花镜花去个把小时为外婆剪指甲,唱京戏哄病痛的外婆入睡,胳膊上都是外婆抓出的红印。当外公唱出《这张旧船票,是否还能登上你的客船》时,外婆笑着笑着便流了泪。这眼泪凝结着一生的风风雨雨,也浓稠了这关于陪伴的爱情故事,这朴素的“情话”,被葛亮捕捉到,扩音给了我们所有人。在这个以多情为时尚的时代,表情的声音更为摄人心魄。

《洪才》传递出的声音更具复杂性。少年毛果以一双单纯的眼睛观察着整个时代的特征,他与洪才的友谊,与阿婆的情谊是整个故事中最能牵动人的部分,然而作者却并未就此止笔。他写以破釜沉舟的方式追求爱情的成洪芸,写穿着新潮衣服放荡不羁的成洪政,写为了争抢顶班名额而反复逼迫成父的成家大哥二哥,更写出了成家这“世外桃源”如何被城管驱逐出去,被迫成为南京市“区”和“谐”的一部分。在没有了鸡鸭、瓜果、粮食之后,面对连老屋都无法保存的现状,阿婆没有熬过这最后一个夏天。《洪才》可以被看做是一声高亢又悲哀的诉说,毛果的讲述刺痛了读者的感官;而《泥人尹》则把这种控诉之声转向了比时代更为复杂的人心。为了给残疾的养子娶媳妇,尹伯伯不顾自己的身体,甚至放弃一直以来坚守着的艺术传统,没日没夜赶订单,塑造了一个个泥人销往海外。而身体垮了之后,儿媳妇却带着全部家产人间蒸发。泥人尹从来没有大放悲声,这极致的悲哀却又久萦绕在读者心头,那种拼尽全力最后毁于一旦的伤痛,像是寒夜的风刀,伤人入骨。

《安的故事》和《威廉》写的无疑是现代生活之下,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发出的暧昧之声。声音中裹挟着坚持、放弃和难以攻克的优柔。安不停地更换外国男伴,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创伤,甚至被当做了卖淫女,只是



不久夫妇俩果然从大使那里收到了加利先生那恭敬的、充满中埃友谊的美好题词。

不过若将外交家与作家这两种身份加以衡量,彭龄夫妇最本质的身份恐怕还是后者。因为外交官是国家授予的职责,而写作则是出自自己的天赋,加入作协更是自己的自觉要求。那么在《书影月痕》中涉及最多的题材是文学就不足为怪了。从他父亲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俄苏文学到他自己专业所在的阿拉伯文学再到对我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那一篇篇阅读心得常常伴有深入细致的艺术分析和独特感受,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至于某些亲身经历或直接参与的事件,读来更令人刻骨铭心。如《带不走的那份沉重》,内容丰富而复杂。它不仅赞颂了前苏联时期写《暴风雨》《解冻》《人、岁月、生活》等的大作家爱伦堡伟大而沉重的一生,而且还对他父亲早期革命翻译生涯的故事做了揭秘性回顾。

《书影月痕》涉及的多位西方作家中,看

葛亮《七声》:

以声绘世

□陈曦

为了最终取得身份去外国生活,这与《我爱比尔》那样不同,她不是别无选择,她只是想把心中的执念化为现实。当然,故事里还有对“我”,这另外一条拴在一起的鱼复杂又单纯的情愫。而《威廉》中的二世祖连花丛吸食毒品,却把心中最柔软的地界留给了自己患病的女儿,他的不羁和温柔将他撕裂又重组,最终构成了“这一个”他,并留下他生活中苦苦徘徊的身影。《威廉》传递出暖昧的声音,蕴含着无助又透露出坚定,我们无法辨别开来,却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七声》中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无疑是《阿霞》和《英珠》。这两个文本都以一种

紧张灵赋的方式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告,偏偏还夹杂了剪之不断的脉脉温情。

阿霞的木讷和专注似乎成为了她的代

名词。她总是在默默地叠着纸巾,这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她做起来却极为认真,表情肃穆,中规中矩。英珠则是近乎执拗地呵护着小马驹“弟娃”,甚至在漫天大雪中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它的身上。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坚持,无论旁人能否理解,依然故我。阿霞抓着第一天上班迟到的我去找经理并对经理的处理方式心怀不满,当她得知是一直照顾她的安姐偷拿了饭店里的现金后,毫不犹豫地当众揭发,这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做法,与其说是她“精神”有异于“常人”,不若说她拒绝与这“人情世界”同构。相似的,十分需要生意维持生活的英珠,在担忧大雪降临时,宁愿“违背约定”不做生意,也不愿让她的马驹受到伤害。她们是集体里的“独行人”,也是“坚定者”。

当一向自我边缘化的阿霞为了保护被客人挑剔的安姐而冲上去破口大骂时,我们看到了终于“发病”的她。而她经过缜密计划后,抱着鱼死网破的心态去重伤安姐的混蛋丈夫时,我们又看到了她清醒的“发病”。整个故事中,她从没有为自己而爆发,难以忍受时也无非是紧紧抓着头发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她隐忍、坚强、沉默,令人动容。而她在警局不停默念的那句“我有神经病,神经病杀人是不犯法的”是那么让人心痛。她有她的坚持,但也有她的怯懦与恐惧。

故事的最后,在偏僻的贫穷之地,嫁为人妇、身为人母的阿霞,似乎找到了最终的归宿,然而她面对不期而遇的我时,看似淡然处之,读者却在文本“头也没抬,嘴里说,什么时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说你见到阿霞了”中听到了阿霞的不甘、怀念与万般无奈。

英珠的所有苦痛几乎全部被牵系在那条绣着她和丈夫姓氏的毛巾上,大家都关注到了她对于马驹过分的爱,却鲜少有人能够体察她脆弱的内心,她已将对意外而亡的丈夫全部的思念和温柔倾覆到了马驹这惟一的遗留下。她在茫茫寒雪夜唱起的那支清丽悠远的歌,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刺痛,那是高原之上的“问苍天”。

葛亮的文字,有着自己的腔调,更是在节奏上“以声夺人”。《七声》中的每篇故事都有自己的节奏,如皮黄声声,入耳入心。紧张处如“将军令”大开大合,娓娓处如“柳青娘”敛袖含葩,既有“姹紫嫣红开遍”的水墨腔,亦有“秋风起扫叶之声”的悲感调。在整部书中,文字之声与意蕴之声互为表里,同声共振。

《七声》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这源于作家寄寓其中的深情。以声绘世的葛亮,着笔处具有情。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塑造的世界,要用耳朵听。

《《七声》,葛亮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来作者最为钟情的是浪漫主义作家,尤其是英国的那三位早夭的青年浪漫主义诗人。难怪刚读完专写拜伦的那篇佳作以后,又发现还有一篇把这三位诗人作为三位一体来写的妙文《罗马三月悼诗魂》!而机缘恰恰是由于作者参观罗马西班牙广场的“三位一体教堂”而意外发现其近旁的这座小三位一体纪念馆。它原本是济慈的故居,后来上述诗人们的粉丝把这座三层小楼的第二层买了下来,设立为三位诗人的共同纪念馆,不愧是有识之士功德无量之举义。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以美学之贡献而言当首推德国浪漫派,她最早透露了20世纪的美学先兆。但若论时代豪情之强烈、推动历史之进步而言则无疑是英国浪漫派,其中尤其是上述三位青年诗人。他们对于封建复辟势力、社会黑暗和殖民统治不共戴天!而且他们这种强烈的反抗精神并不止于诗歌创作,亦诉诸于行动,即鲁迅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当年身处“黑暗如磐”的祖国的鲁迅,室闷于“铁屋子”里,充满急欲要把它凿穿的强烈反抗情绪,因而与上述浪漫主义诗人产生强烈的共鸣。他当年写的《摩罗诗力说》(1907),呼唤“大呼猛进的斗士”,其楷模就是这批“撒旦”式的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拜伦。不独有偶,视“行”基于“言”的德国文豪歌德亦对拜伦赞美有加,显然这跟拜伦身体力行,最后死在反抗殖民主义的希腊土地上有关。三位青年诗人以拜伦的年龄最大,雪莱小他4岁,济慈又小雪莱3岁。但他们离世时,次序却倒了过来!而最后离去的拜伦,天年也不过36岁!对于文学星空中这一小群彗星式的天才,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无不在赞美之余,深深地感到惋惜。如今《罗马三月悼诗魂》的作者以其亦喜亦悲的笔调,舒解了读者心中久久难以排遣的遗憾,读之岂不快哉!

《书影月痕》的两位作者毕竟都是阿拉伯语专家,他们自然不会放过机会向读者介绍阿拉伯文学中的精华,首先是那些与他们有直接交往的作家。他俩确也没有辜负读者

的期盼。除了前面提及的诗人奥贝德教授以外,还向我们推荐了两位世界级的大家——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和埃及的马哈福兹。阿多尼斯也是黎巴嫩一条负载着诸多文化蕴涵的古老河流的名称。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的气魄及其作品的精神气质。但他有多年的西方(法国)学习背景,还成了巴黎大学的教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故他对阿拉伯的传统文化首先持反思态度,称自己“是犹如中国鲁迅那样的批判者”。与此相关,他也崇尚主张价值重估的尼采。不难想象,批判和反抗成了他的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同时,他的诗歌形式也是现代的,先锋的,因而是世界的。因此,他先后获得多项重要的国际奖项,包括一项2013年中国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授予的“金羚羊奖”。说来也巧,笔者作为该诗歌节每届组织工作的参与者之一,也是金羚羊奖的评审委员。在投票之前,就听熟了评委们对阿多尼斯的众口一词的高度评价。故在读到《书影月痕》对阿多尼斯的诗和人的评说时,深感共鸣。

《书影月痕》的两位作者曾出使埃及4年。他们与埃及文学的往来最堪欣慰的莫过于与埃及文学泰斗马哈福兹的结识了!这是阿拉伯世界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而他始终平易近人,接近民众,每天上班来回步行,一路上随时与人打招呼搭话,沿途成了一道生动的人文风景。难怪他读到老舍的《骆驼祥子》喜不自胜,两页贴近百姓的心很快张贴在一起。也因此很快与这对来自中国的新朋友拉近了距离。最后他竟然带着因受重伤而颤抖的手为这对中国朋友题词、签名留念。从这些细节中我们窥见了这位看似平凡作家的不平凡的精神世界。他与以上提及的几位阿拉伯民族精英一样,鲜明地透露出中阿两个伟大古老民族之间的共同的精神情怀。

以上写的不过是随意“点击”,你看已经可以说异彩纷呈。读完它吧,你会收到一个文学和艺术、知识和智慧的大礼包!”

《《书影月痕》,彭龄、章诒著,五洲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

人性深处的微光

□吴 情



2016年,通过著名华人导演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国部分读者第一次知道了原作者本·方登(Ben Fountain)这个名字,之后,新经典文化推出了《漫长的中场休息》(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中文读者得以接近这个不多产但质量极高的美国作家。其实,在《漫长的中场休息》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之前,本·方登长期进行短篇小说写作,他的短篇小说集《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Brief Encounters with Che Guevara),便已为他摘得笔会/海明威奖,一个具有相当含金量的奖项。

方登与那种天才型作家拜伦、普希金等不同,他拥有的不是笨功夫,是工匠一般的专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懈打磨。正是这一点成就了他的小说,一种很难模仿的本·方登风格。《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收录了八篇小说,每篇都堪称不俗。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少都是美国人,但是其人生经历,与海地、古巴、墨西哥等异域存在紧密关联,这些联系有时还成为其生命的转折点——从活着到追问活着意义,进而做出自己的选择;即便困难重重,无论结果好坏,这些选择都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力量。

八篇小说,故事情节各异,但人物大多陷入到人生困境中,一时间无法解决。《良人难寻》中的士兵德克,在驻外的平淡生活中,游走于虚无的边缘;《中部山脉近乎绝迹之鸟》中的杜克大学鸟类学家约翰·布莱尔,在安第斯山脉研究鸟类时意外被一伙叛军俘虏,生命因而危在旦夕;《海地之梦》中的美国驻海地观察员梅森,因为与手下人下了盘棋,竟然答应帮忙走私海地的名画,平静的生活顿时掀起波澜;《博奇与可卡因》中的西多·查尔斯和路路,发现毒品上交警察后,发现正是警察交易毒品,正直的路路叫骂之后遭到毒打,甚至被视为疯子。诸如此类。

然而,身处逆境,这些人并非碌碌无为,而是竭力抓住机遇,改变自己,甚至促成周遭世界发生变化。德克皈依了伏都教,生命的意义因而得到肯定;《良人难寻》;约翰·布莱尔试着证明自己科研人员的身份,在得知叛乱分子的活动可能危及安第斯山脉一种近乎绝迹之鸟的生存时,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交换,尽管最后被送还至美国;《中部山脉近乎绝迹之鸟》;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梅森帮助了海地革命分子,战栗之余亦很澎湃,尽管最后发现他们在回来前已被当局抓获,回天乏术;《海地之梦》;既然当局腐败,西多和路路再捡到毒品,联合当地民众,转而托人贩卖之,改善了当地人的生存状况,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博奇与可卡因》)。

现代小说揭示人的精神困境,试图为人类的救赎提供可靠的途径,但多半以失败告终;然而,后现代小说,则取消了优美、崇高、意义等范畴,追逐语言自身的游戏,放逐任何文学指示现实人生的可能。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每个作家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是信奉文学救赎论,还是放逐文学。本·方登的《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虽不至于直接通向文学救赎人生,但起码表现出文学仍对人性深处的一缕微光表示热切的希望;这当然不是简单的乐天,盲目地认为一切都会变好,而是在对复杂世界的充分把握下,相信道德伦理,相信善的力量;你眼中有光,便可给世界添一分亮。

《《与绝迹之鸟的短暂邂逅》,[美]本·方登著,徐佳雨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10月出版)

■新书品荐

特约撰稿:李林荣

《心画》,[美]卜寿珊著,皮佳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近年,有关“南画”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著作,在读书界渐渐升温。一段文人不仅通过写作、绘画来寄托心志、表达思想情怀的历史,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的叙述和展示中,重新清晰生动起来。这本副名为“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的《心画》,并非趁着眼下图书市场上的“南画”选题热赶场出炉的新书,而是40年前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一本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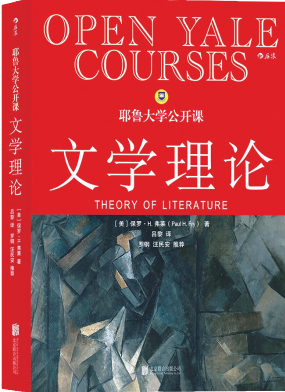
的修订版。现在它首次以汉译版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带来的知识和见解却仍然充满新意。许多类似名目的新出图书,都在用橱窗和展柜的结构,把各家各派的各路作品,摆进文人画演变的终端,也就是所谓“南画”的概念框架里,做静态的陈列。由此,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南画”一开始就是一座高大的殿堂,里面专门供奉已经修成正果的十八罗汉。当然这也不算错,因为如果依当下的眼光,那么无论多大纵深的历史传统,都可以看成共时并存的一个平面。《心画》的做法与此截然相反。它虽然也依托了现代学者归纳的“文人画”概念(如滕固先生的说法:由士大夫而非画工,在闲暇时为表现自我而非实用目的,进行的风格有别于院体画的绘画创作),但并没有拘泥于概念本身,而是由此回溯相关的史实脉络,讲述了文人画从自在自发的现象到着意提倡的潮流,从单一走向丰富,从边缘转入中心,历经北宋、金、南宋、元、明前后5个多世纪的曲折演变,最终蔚然定型,升腾、凝练出涵盖整个中国画的南北宗理论的全部故事。

按照这个故事,文人画最初得以崛起为画风、画论中的醒目一派,不迟不早偏在北宋,既是作画者、持论者中的活跃分子苏轼的个人声望所致,更与入宋以后士人阶层首次有机会突破门阀垄断、跻身显贵集团,成为社会文化的定调者和支配者这一时代大变局相关。而在为“士人画”大张旗鼓申论立说的第一代人的说法上,即便是谈及同一位画家文与可的艺术修养,苏轼“道可致而不可求”的妙悟至为,才情为本之见,和黄庭坚“使胸中有数百卷书,便不愧文与可矣”的书卷气感慨,也显露着和而不同的旨趣。

南宋和金分据南北时期,隔绝学术文化交流上百年。全国文人全盘接受了北宋文人的文化艺术传统,南宋则大肆复兴画院,发展皇家艺术,沿袭五代和唐朝旧习。当13世纪中叶之后南北文化再度汇合、并落入对文人阶层压制趋越严厉的元朝统治下,长期流落南方民间的文人画,已经积淀起了在墨笔和兰梅竹菊、松石马匹等技法、题材上投入尤多的特征,跟保留着描摹山水习惯的北方文人画有了区别。但也正因为文人和文人文化遭遇整体贬低,在缝隙中求生存的“文人画”收缩到隐逸含蓄和简率复古的小路上,取代诗歌,成为文人表达自己文化造诣的基本形式。赵孟頫和黄公望还抱着再释古典的态度,为南宋文人画里一度式微的山水画重启了生机。

这种文人画和院体画杂糅的潜流,后经明代吴、浙两派画家程度不同的推动,终于导致晚明董其昌所面对的艺术态势:文人画和院体画都脱离了创作者的社会身份和居地域,也不再能够和题材、风格上的特定取向相对应。于是,援古证今,反拨流俗,借禅宗南顿北渐之说,引唐代王维、李思训为宗,中国西南北宋分流发展的史论就此登场。其实际效果并不仅在于对文人画精英地位的重新振振,更重要的,是阐明了士人阶层尊崇个性创造的精神对整个中国艺术史和文化史的关键推动作用。

《文学理论》,[美]保罗·H·弗莱著,吕黎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12月出版



耶鲁大学公开课讲义系列的中文译本已经出了七种,在数学、哲学、政治学、金融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之后,姗姗来迟的《文学理论》总算面世了。作者保罗·H·弗莱是耶鲁大学英美文学系讲座教授、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专家,书稿底本来自他2009年春季学期在耶鲁大学讲授公开课“文学300”现场录音的文字整理版。

全书依26个课时分为26章。其中,导论两章,介绍文学理论的“前史”、兴起及功能。之后24章,归在“对阐释和阅读的第一组反思”、“文本和结构”、“作者(读者)心理”、“社会语境”、“反对理论与支持理论”五个主题下。另有两个附录,一个是与各种对应的理论原著引文句段摘选——“讲座上引用的段落”,另一个是作者的助手、比较文学研究者斯蒂芬·埃斯波西托写的一篇经典文论导读长文《文学理论的种类:文学理论延伸阅读指南》。

与以往多见的国内外文学理论讲义类读物不同,这本《文学理论》在篇章体例上彻底摒除了叠床架屋、层层切割的教科书套路。中药铺式的名词术语小抽屉,俄罗斯套娃式的理论标签迷彩,统统不见踪迹。取而代之的是26章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带着确定、清晰的自我意识和连贯、畅达的认识理路,对各路理论既纵观通览、又细读详解的总体把握。在这种把握中,横向的关联通贯,历时性的来龙去脉,都得到了精要的揭示。尽管这门课和这本书都只是设定在文学专业本科生基础课的层次,但它对知识的呈现,不是浮皮潦草的泛泛介绍,更不是零敲碎打的散乱杂凑,而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梳理和始终保持着独立观点的系统阐发。

此外,从聚焦阐释学和现象学的第一个主题开始,直到包含了美国新裔批评、后殖民批判、酷儿理论以及文学研究的制度建构等理论跨界新范畴的第四、五个主题,书中知识面的延展,都是紧随着解析理论的实际需要,不以文学的边界为限。比如对于阐释学传统迂延轨迹的勾勒:因宗教改革兴起,又在宪政时代从宗教转向法律,再借浪漫主义高涨之机,才最终介入文学。又如讨论审美对象的非功利性时,书里接连引述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辨析“愉快”、“善”和“欲求”以及“趣味”的两段话。

这些也许看起来不那么轻松的内容,把文学理论的根,一举创到了文学圈以外的社会历史土壤中。论比重,它们只占全书的极小部分,但它们像肌体中的血脉筋络一样,证明着文学理论的活力源泉总在世界的深远处。